

社会转型与文学研究丛书

主编：高楠

# 魏晋时局 与魏晋文学

王 巍 著

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寄托遥深的正始之音，繁缛绮合的太康诗风，垂式千秋的咏史新体，耳目一新的田园赞歌，林林总总，无不展示出中古文学的风采。

战乱，魏末的天下多故、西晋  
会土壤。其心灵震撼所抒发的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社会转型与文学研究丛书

主编：高楠

# 魏晋时局 与魏晋文学

王 巍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总序

高楠

中国正经历着文学与文论大规模建构的风暴，先前的一套稳定的模式，在质疑与批判中松动、解构、重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质疑与批判的主体力量，又恰恰是在先前稳定的模式中确定其学术基业的学者，他们是在进行着营垒中的反叛，他们揭竿而起。他们所质疑与解构的，恰恰是他们的学术本体。那么，他们何以进行这种近乎于自戕式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精英防线在作了一番艰难的守护后终于溃决；大众喧嚣不已的呼声经由当代传媒的鼓噪，发出大潮奔涌般的强力，把文学推上市场的旷野；文论面对大众文化带来的文学骤变，时而激愤，时而避闪，时而失语，又时而逐流；历史的回声被现代性狂欢阻断，后现代的晨钟又以回声的方式震动历史；全球化进程把大洋彼岸的季风带入焦渴的理论荒丛，民族特色的寻觅又使那季风转化为本土的春潮……这样的描述性话语并非表述激越的诗意，它只是文学与文论状况的诗意表达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表述中，一个理论追问再次袭来——它们何以会如此？

这一切，都须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求解。

毋庸讳言，当下，中国正经历着声势浩大的社会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很多方面，包括无数的生活的枝梢末节，也都在潜移默化地变化。人们身在其中，因变而变，随变而变。当随着时光推演这样一步步地在变中前行时，人们只觉得每一步都和前一步不同，却感觉不出一个巨大变化

的轨迹。然而，经过三十年步步前行，回首走过的路，才深刻地感受到这是怎样的一段陡转崎岖的路，又是怎样的一段意义重大的历史。而这一代人又正是这一段路这一段历史的参与者、思考者、创造者。这使从事学术研究的我们感到有责任记述这一段历史，求解这一段历史，阐释这一段历史。其目的不是留下我们的思考——任何时代任何人都有思考，却未必都是有价值的思考，而是留下这段思考的历史，是思考着的这段社会转型期的历史。

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变革，当然也可以说，社会变革带来的社会转型，其牵动无所不在。社会转型就其深层根据而言，是既有社会控制、协调、管理的体制及支撑着这一体制，使之成为这样的体制而不是另一种样式的体制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系统性的动因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体中，由于后者是一种历史性的物质力量，是基础性的、发动性的、无可阻挡的力量，因此它具有充分的实现性，而此前它所支撑的社会体制，则是使其实现或阻碍其实现的被实现或不被实现（被否定）的条件性存在，即是说，社会体制相对于社会的原生动力而言，前者是后者得以实现的条件。这种关系，用经典的说法，便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经典的说法是更具概括性的说法。当体制的条件状况在总体上成为社会原生动力或物质性力量的压抑条件状况或否定条件状况时，前者的总体性的改变就无可避免。这时，任何局部修补都无济于事，整体性的体制调整，便成为社会转型的基础性需求。而顺应这种原发性物质力量需求向既有社会体制发起变革性思考及运作的人，便是社会变革的先行者，这样的先行者见于代表性思想，便是启蒙家，见于代表性行为表现，便是改革家，见于政治发动，便是社会转型的领导者。时下中国正进行着的社会转型，便是应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的需求，由国家决策部门所政治地发动的，由启蒙的思想家们所精神地或意识形态地阐发的，由众多领域的改革者所实践的历史与时代在矛盾中不断融合的多元化转型。

随着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变革而相继发生的，是社会结

构的变革，这一变革是既有社会体制向各社会领域延伸的细化结构的解构，同时也是在体制改革带动下的新的社会结构的建构。这样的解构与建构过程因其细化而成为人们切身于其中的过程，每个人都被带入其中并且在其中成为过程的构成者，每个人又在过程的构入中成为具体的实践者。这是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的运作者，大家在实践理性的运作中，变更着先前的行为模式，松解着先前的行为系统，大家又在行为系统的变动中与规定着实践行为取向的社会价值体系相遇，与新构成的行为模式相遇，同时，也与因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而引起的变化了的社会关系相遇。这些在社会体制与结构的变革中与每一个人相遇的外部力量，或每一个人都在其中的外部构成性力量，经由实践内化为人们的相应于社会转型的思想意识，人们对眼下发生的一切，据此而思考、而判断、而评价、而言说议论。思想家们在思想上启动这一过程，又凝敛与提升这一过程，由此形成着社会转型期的思想理论。

这套“社会转型与文学研究丛书”的出版，是国家教育部十一五“211工程”学术立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学与文论”研究的标志性成果的集结。该项目从文学与文艺理论的角度进入社会转型期的思想理论建构与系统阐释。像其他思想理论领域一样，文学及文论的理论思考也是一个历史的前承后继的过程。当然，思想理论的前承后继并不是线型延续的过程。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提出并示范式地运用的谱系学方法，在后来者的进一步发挥与阐发中，已成为一套有很大学术沿用价值的方法论，这种价值来源于它合于历史的发展状况，并因此成为开启与思考历史过程的根据。谱系学的一个重要看法，就是认为历史的延续性不是连续的、绵延的，而是断裂的、跳跃的，历史的延续性是实现于具有某些基本相似点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跳跃式回放、复制与基本相似点的递变中。如先秦时期的社会转型、初唐时期的社会转型均引发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个人与他人与家国社会的关系，两次转型的发力点与着力点都与这个问题密切关联，并且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延

续性——人的个体能动性被强烈地激活、肯定，人的被禁锢的思想得以自由释放，不过这种被激活被释放的个性自由却没有像西方文艺复兴那样，转入以平等为自由尺度的独立的个性发展与张扬，而是被导入复杂的人伦之中，强化着家国共体的入伦秩序。由既有人伦基点出发经社会实践转入个性激发，再将这激发的个性能量回落于进一步建构的入伦秩序，从先秦至初唐的两次社会转型跨越数百年的历史断代，实现着社会的基点性延续。

基于这样的历史延续性的理解，本选题把先秦至今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转型作为关注与学术取向的要点，把不同社会转型期的文学与文学状况作为研究对象，提示社会转型与文学与文论的内在联系，这样，文学与文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基本范畴，如诗言志问题、诗的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问题、诗的情感本体性问题、诗法及技巧问题以及诗的乡土母题、人生序位母题、生命体悟母题、爱情母题等，都跳出就这类问题去思考求解这类问题的传统研究方法，而是将之放入各自所属的社会转型时期，深入到社会转型的体制、结构、行为系统、思想意识层面，抓住期间的历史批判力量，不同社会层面的结构系统与行为系统的演进过程及演进形态，梳理并阐释与相应的历史批判力量、系统演进过程及其形态相应的思想意识，揭示这些社会因素是如何以其转型变化影响文学与文论，形成既有文学与文论的批判与解构，并进行新的文学与文论的提升与建构的。

文学及文论，有自己的系统性，有自己的内在规定性，也有自己的演进变化规律，深入进去，进行文学与文论的自身研究，这是此前经常被用到的研究方式，亦即向文学及文论本体内敛的研究方式。然而，文学及文论的自律同时又是他律的，而且是他律的自律，它总是被规定的，规定它们的是它们在其中的更大的社会文化系统，后者是它们得以如此的条件，是它们被特征化的语境。这种情况决定着文学与文论的任何状况的出现，任何命题、判断及范畴的形成与提出，都需要在更大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寻求动因与根据，这不仅是个方法问题，这更是原本如此的规定。既然如

此，与本体内敛的研究方式相对应，就必须向着社会文化系统进行外延式研究，使文学及文论问题，在其由社会文化系统所织就的周边网络中得到构成性研究，并由此揭示其何以如此是何以如此为的根据。本套系统著作，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把文学与文论的各种基本问题及焦点性问题，放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转型的条件性背景中予以求解。这样，文学及文论与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系统、社会思想意识的关系便得以还原，便走出了传统的偏重于文学及文论的封闭的、孤立的研究状况，具体化着有机整体的、动态的、互动生成的研究方法。

还须指出的是，本套系统专著，在其研究与著述中，有意识地强调其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立足点，从当下的时代现实出发，坚持问题意识，确认在当下社会变革中文学与文论所面临的难点与焦点问题，在社会转型的不同历史阶段中，通过向着当时的社会文化系统，在本体内敛式研究的同时，努力开阔视野，进行条件性与语境性的外延式研究，以此求得文学与文论的历史问题的时代解答；同时，又把这一解答置入相应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去，形成历史与当今时代的互生互动。就拿全球化进程来说，这是具有当下特征的社会进程，它本身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代表性体现。对于这一进程的学术投入，便使得文学与文论的既有的各种问题都获得更为广阔的背景参照，而在这样的背景参照下，既有问题便发生了视角、意义、侧重点以及提出问题的方式的变化。比如传统的意境问题，此前所进行的多是其意蕴考据及破解性的研究，而在全球化视野中，与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相比，它成为具有中国文学与文论的传统特色乃至根基特色的问题，它充分地体现着中国传统所特有的、有机整体的、浑融的、流动变化的、互动互生的思维方式及表述方式，于是，意境这一传统问题，便在当下时代高度上从文化根基与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角度被强调地提出。

本套系统专著的标志性成果见于十个方面，这十个方面，勾勒出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与文论的代表性问题。这十个方面即：改革

开放三十年中国文论建构、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文学理论热点问题，西论中化与中国文论主体性、中国文论与文学的现代性、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及传播形态、中国现代时期的文论建构、历史变革中的文学经典研究、历史转型期的文体演进、春秋转型期孔子的礼乐思想与文学观。这十个方面，均抓住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均突出文学与文论与其社会文化语境的关联性并将之作为思考的要点，均在社会文化语境与文学及文论的历史关联性中确定有历史代表性的文学与文论命题，并且均在社会转型的历史与现时语境中对这些命题予以论证和求解。这里涉及史论兼用的问题、社会文化的历史追问问题、文学与文论的理论基点问题、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与文论的特色开掘问题、文学及文论传统的当下转换问题、文学及文论的现代性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当下文学与文论建构的焦点问题，每一步思路展开都富于挑战性与开拓性，每一部成果的产生都显现着中国学人的学术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都验证着建构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学术功底与智慧。



##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汉魏之际的历史转折 .....	11
第一节 政治与思想的转型 .....	11
一、黑暗的政治与痛苦的民生 .....	11
二、儒学衰微与异端思想崛起 .....	18
三、变动不居的社会思潮与变化的士人心态 .....	28
第二节 汉魏诗风的时代转换与乱离中的诗人 .....	34
一、建安文士的文学觉醒 .....	34
二、崛起的邺下文人集团 .....	50
三、建安诗人 .....	59
四、“梗概而多气”的诗歌风格 .....	83
第二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	86
第一节 政权更迭的正始时期 .....	86
一、司马氏集团与皇权的较量 .....	86
二、虚伪的名教与残酷的政治 .....	89
三、正始玄学与正始名士 .....	91
第二节 正始文学的基本风貌 .....	106
一、“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文学意义 .....	106
二、抒写忧愤，追求旷达的创作主题 .....	108

三、揭露时弊，追求高远的创作主题 .....	114
四、隐约曲折、清峻逸远的诗歌风格 .....	118
<b>第三章 西晋世风与文风之变 .....</b>	<b>123</b>
<b>第一节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西晋社会 .....</b>	<b>123</b>
一、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	123
二、维护皇权与分裂皇权的火拼 .....	125
三、士人复杂的心态及沉浮难料的命运 .....	127
四、魏晋风度的展示 .....	130
<b>第二节 繁缛绮合的太康诗风 .....</b>	<b>132</b>
一、巧构形似，味之亶亶 .....	133
二、辞藻富赡，英华膏泽 .....	137
三、情深语佳，辞藻清丽 .....	141
<b>第二节 建安诗风的再现 .....</b>	<b>145</b>
一、古质健劲，音节激扬 .....	146
二、文典以怨，讽谕之致 .....	150
三、意概不凡，雅壮多风 .....	158
四、“辞多慷慨，乖远玄宗” .....	161
<b>第四章 偏安江左的腐败政权与玄学向文学的转变 .....</b>	<b>168</b>
<b>第一节 家园之变与文人心态 .....</b>	<b>168</b>
一、政出豪门的特殊时代 .....	168
二、“此非吾土”的文化心理 .....	172
三、士人追求高傲放达的不同情态 .....	175
四、士人的偏安心态与审美情趣 .....	182
<b>第二节 山水诗的孕育 .....</b>	<b>188</b>
一、士大夫的山水审美活动 .....	188
二、“流觞曲水”的兰亭吟咏 .....	193
<b>第三节 以理代情的玄言诗创作思潮 .....</b>	<b>197</b>

一、关于玄言诗的义界 .....	197
二、东晋的玄言诗 .....	205
三、玄言诗的审美特征 .....	210
第四节 玄佛相融的僧诗 .....	212
一、对佛理的体悟 .....	213
二、以玄思悟禅理 .....	216
三、对山水之美的体验 .....	220
四、僧诗的审美特色 .....	224
第五章 陶渊明——开创诗歌的新园地 .....	227
第一节 魏晋风流的代表 .....	227
一、陶渊明艺术化的人生 .....	227
二、陶渊明的思想与人格 .....	236
第二节 陶渊明对诗歌题材的开拓 .....	239
一、静谧甜美的田园之歌 .....	239
二、抒情言志的咏怀之歌 .....	245
三、充满情趣的哲理之歌 .....	251
第三节 超群拔众的艺术风格 .....	254
一、平淡和谐的自然之美 .....	254
二、展示“猛志”的豪放之风 .....	258
三、善于在抒情中融入朴茂渊深之理 .....	259
四、自我化身的意象 .....	261
第四节 自叙情怀的辞赋与散文 .....	262
一、自我形象的再现 .....	263
二、心灵与行动的回归 .....	265
三、理想社会模式的建构 .....	268
第五节 士大夫的精神家园 .....	271
一、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 .....	272
二、士大夫的精神归宿 .....	281

## 引言

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一个乱世，这要从东汉后期说起。东汉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政治极端黑暗；加之外戚和宦官的交替专权，使东汉政权日趋腐败。如和帝即位以后，窦太后临朝听政，而其兄窦宪为大将军，“威震朝廷”。安帝即位后，邓太后临朝，后兄邓骘秉政。顺帝即位后，梁氏掌权，其父梁商、兄梁冀为大将军，仅梁冀掌权就达24年之久。梁冀秉政期间，收刮四方货财，“充积藏室”。为了狩猎取乐，他“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殆将千里”<sup>①</sup>，作为他的园苑。而宦官专权同样骄横跋扈。《后汉书·宦官列传》揭露了宦官专权的丑行：“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在宦官、外戚的斗争中，由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也在起作用。宦官专权，使朝中的官僚遭到排挤和压抑，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东汉历史上有名的两次“党锢之祸”。在当时诸种矛盾中，民族间的矛盾也很尖锐，统治者对从边境迁到内地的少数民族也进行了残酷的掠夺，引起了西羌等人的反抗，曾发生了两次延续数年的大暴动。这些，无不给东汉王朝以沉重的打击。还有当时不可抗拒的水、旱、虫、疫等各种天灾接连而至，使百姓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使本来就已经激化的各种矛盾都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终于在公元184

---

<sup>①</sup> 《后汉书·梁统列传》卷三十四，第1182页。

年爆发了规模宏大的黄巾农民大起义。一些豪强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扩充了军事实力，纷纷拥兵自强。董卓带兵进入了洛阳，掌管朝政大权，专横跋扈。各路豪强势力联合讨董，拉开了天下混战的帷幕，使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长期混战的状态。混战更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生灵涂炭，中原大地到处呈现一幅相同的画面：“千里无鸡鸣”，“白骨蔽平原”。正如百姓所歌：“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sup>①</sup>从东汉后期的董卓之乱，到三国时的魏蜀吴之争，呈现的是“生灵板荡，关洛荒芜”的局面。

曹魏王朝后期，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阶段，不断出现恐怖的屠杀事件。《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景初）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还至河内，帝驿马召到，引入卧内，执其手谓曰：‘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司马懿当时是“顿首流涕”。就这样，当时任太尉的司马懿和曹爽受曹睿之遗诏，辅佐年幼的齐王曹芳。他们一为曹氏宗室成员，一为朝廷军事重臣。在这场维护皇权与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司马懿以阴险狡诈的手段战胜了曹爽，不仅曹爽兄弟被害，而且其集团中的何晏、丁谧、李胜、毕轨、桓范等诸位名士也相继被诛灭三族，造成了极端恐怖的政治局面。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自立，建立晋朝，结束了三国分立的局面，使社会暂时得到了稳定。但好景不长，晋武帝一死，司马氏宗室诸王竞相网罗党羽，扩充军队，并拉拢士族官僚，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伺机抢夺帝位。八王乱起，达到了这场骨肉相残、权力之争的高潮。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夺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使社会经济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西晋王朝只维持了半个世纪便覆亡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国几百年的分裂和战乱。

永嘉乱起，北方官僚士族纷纷南渡，与当地士族联合起来，推举进驻建邺的琅琊王司马睿为帝，于公元317年建立了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当时中国北方处于分裂割据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东晋朝廷经常面对的是

<sup>①</sup> 《后汉书·皇甫嵩列传》卷七十一，第2302页。

被北方各族统治者发动的侵扰进攻局面。统治集团既无励精图治、团结御侮的信心，更无北伐中原、统一中国的大志，而对百姓则采取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政策，致使内乱不断爆发，使人们遭受更大的劫难。东晋王朝就是在民族的、阶级的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困扰中生存的。公元420年，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兴起的刘裕废晋帝，建立了刘宋王朝。结束了东晋王朝风雨飘摇的百余年统治。

魏晋社会分裂动荡的时局，对当时士人的思想意识、审美观念、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儒家思想是随着汉代大一统政权的建立而被确定其正统地位的，汉代末年大一统政权动摇了，那么盛极一时的儒家思想就必然随之失去其统治力量。皓首穷经的士人从儒家经典的禁锢中解救出来，他们思想活跃，积极思索，对人生、对天道等提出自己异于传统观念的看法，表现出一种人性的觉醒。到了正始年间，道家思想复兴，玄学思潮兴起，士人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他们说‘三日不读《老》、《庄》，则舌本间强。’尤其是《庄子》，竟是清谈家的灵感的泉源。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sup>①</sup>。士大夫文人在新的精神支撑下，对个体人格、生存方式等有了新的选择。他们要冲破儒家名教的锁链，还心灵自由的自我，追求的是“颖悟、旷达、真率。如果再加以概括，则可以说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或者说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sup>②</sup>。这就是魏晋风流。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流露”，可谓“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sup>③</sup>，即弃功名以求自适。这种艺术化人生的追求，在《世说新语》中有很多描写，如：“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刘孝标注引

① 《闻一多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79~280页。

②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下引此书，版本同此），第15页。

③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文士传》曰：“张翰字季鹰，……有清才美望，博学善属文，造次立成，辞义清新。大司马齐王罔辟为东曹掾。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捉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翰以疾归，府以辄去除吏名。”<sup>①</sup>在魏晋“天下纷纷未已”的乱世，处在政治漩涡中的文人厄运不断，沉浮难料。为避害远祸，他们由市朝宦途，转向山水自然，想往着家乡的“南山蕨”、“三江水”。追求人生的“适意”，成了当时士人的一种追求。如“当其得意，忽忘形骸”<sup>②</sup>的阮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其十四）的嵇康、“仰望碧天际，俯磬绿水滨”（王羲之《兰亭诗》）的王羲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的陶渊明等，无不表现了对人生“适意”的自觉追求，对个性化自我的向往。魏晋风流对魏晋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的觉醒加速了文学的自觉，促进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在两汉时文学的自觉无明显痕迹，这时对文学的内涵、审美特性，虽有揭示，但还不是自觉的。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了一些文学理论论著，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等。他们不仅提出了重要的理论概念，如“文气说”、“缘情说”等，还对不同文体及风格有了较为明确的辨析。曹丕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譎诳。”（《文赋》）对文体的分辨比曹丕又前进了一步，特别是对诗赋特质的概括更突出了其审美特征。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从现存佚文来看，论及到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图讖等十二种文体。挚虞着眼

<sup>①</sup> 《世说新语·识鉴》第十条，俞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引此书，版本同此），第393~394页。

<sup>②</sup> 《晋书·阮籍列传》卷四十九，第1359页。

于文体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注重挖掘其蕴藉，等而次之才是体制，并较为详细地探讨了各种文体的产生与演变情况，评论了一些作家作品。在文学评论上，曹丕首开批评之风，在《典论·论文》中用“文气说”来评论作家的风格。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了批评家应具有的态度，即“审己以度人”，改变“文人相轻”的陋习。曹植不仅认识到了展开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即“世人著述，不能无病”，而且还指出文学创作者对批评的态度，那就是“有不善者，应时改定”（《与杨德祖书》）。这种批评观，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另外，这时文人还对文学审美特质进行了探讨。曹丕所说的“诗赋欲丽”，陆机所说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无不是对美的追求。曹植还很形象地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审美标准：“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摘藻也如春葩。汎乎洋洋，光乎皛皛，与雅颂争流可也。”（《前录自序》）即在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要达到美的境地。这种对文学美质的追求，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之一。魏晋文人在探讨文学审美特征的论述中，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审美思想，如重缘情、重个性、重风骨、重意象、重华美等。“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sup>①</sup>

魏晋时期动乱的时局，崭新的文学思潮，直接影响着文人的创作，使之呈现出新的特色。从题材上看，反叛旧观念、爱国思想、忧患意识，以及游仙、隐逸等多种创作题材各呈异彩。乱世文人常常是文学新风的开创者，魏晋时期很多文人就是如此。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对一些传统观念提出质疑。曹操公开声称“性不信天命之事”（《让县自明本志令》），反对“天命”、“天道”，对传统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思想进行挑战，以掷地有声的诗句表达自己全新的理念：“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龟虽寿》）认识到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天地

<sup>①</sup>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第7页。



间，人为贵”（《度关山》），“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不？”（《秋胡行·愿登泰山》）曹丕云：“寿命非乔松，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已终百年。”（《芙蓉池》）“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折杨柳行》）曹植云：“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难烛。”（《神龟赋》）“谅遗名之可纪，信天命之无常”（《节游赋》），“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赠白马王彪》）。陶渊明对传统天道观、神仙、鬼神说也表示怀疑：“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并提出“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的观点。认为自己遭受的祸福与“幽且远”的“天道”并不相干。由于这时文人有着对旧传统观念的批判精神，故使他们之中很多人成为文学新风的开创者，开辟了文学革新的道路。

爱国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学传统的主题。《诗经》中就有许多表现爱国思想的篇章。屈原在《离骚》中则表现了更加深沉的爱国思想情怀。魏晋诗歌中所表现的爱国思想是对我国传统的爱国思想的继承和弘扬。曹操在其诗歌创作中表现了统一天下的胸襟和气魄。曹植在诗文中，倾吐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杂诗六首》其六）的为国家献身精神。张华在《壮士篇》中所表现的驰骋沙场为国立功的豪迈之气，是其爱国情怀的极好写照。左思也有着为国立功的激情：“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咏史诗八首》其一）素有扶危定乱之志的刘琨，在其诗文中表现了匡扶王室的决心，洋溢着爱国志士的雄迈忠义之气。郭璞在其游仙诗中寄托了匡国之志与爱国激情。庾阐关怀国家命运，曾慨叹“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从征诗》），敬慕那些志在北伐复土的爱国将士。陶渊明在其诗文中表现了真挚深沉的爱国情怀，痛感中原沦陷，志在九州统一，讴歌那些具有爱国义举之志士。这一创作主题，充分展示了魏晋文人于乱世所表现的民族气骨、爱国情怀。

与乱世相关联的就是魏晋文人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的对人生短暂的思索。建安文人饱经流离之苦，目睹了广大民众所遭受的苦难，便拿起诗笔